

“要团结千百万的儿童，要收回我们的家乡，我们得和敌人拼个生死存亡”——《台湾少年团团歌》

抗战 台湾少年也没缺席

——访台湾义勇队少年团三位团员

杨雨文 安梁青松 朱江 陈静

抗战胜利70周年，也是宝岛台湾光复70周年。当年，台湾同胞不仅在台反对日本侵略，还有不少人奔赴大陆抗日前线。1939年至1945年，浙赣闽院地区就活跃着一支英勇的抗日队伍——台湾义勇队，由台湾爱国志士李友邦将军指挥，队员从最初的30多人发展到四五百人。义勇队员的子女组成台湾少年团，也投身抗日战争的洪流。

笔者近日寻访了生活在大陆的三位台湾义勇队少年团团员，从他们的身体上体会到了抗战的艰苦与不屈。

朱晓枫：“我们是抗日的义勇军”

朱晓枫，原台湾义勇队少年团团员，现为南京军区总医院离休干部，目前住在南京一家部队干休所，与老伴一起过着平静又满足的晚年生活。朱晓枫的母亲是中共地下党员朱枫，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后，朱枫投身抗日救亡洪流，辗转于武汉、桂林、上海等地。1939年，她将刚满10岁的朱晓枫托付给好友李友邦将军。李友邦把朱晓枫放在台湾义勇队少年团，让她和台湾的孩子们在一起上课学文化。

少年团按年龄分为大班、中班和小班，朱晓枫分到大班。“我从小跟着妈妈到处走，适应能力特别强，属于性格比较独立的孩子。”朱晓枫说，“只要妈妈把我放在哪儿，我就在哪儿呆着。而且我觉得在少年团的那些日子还特别快乐。”

“从1939年到1945年，我一直在少年团读书，算是经历了自己的小学和初中阶段。”朱晓枫说，她当年特别喜欢看书，而且还做过班里的学习组长。“我记得我们看的都是进步书籍，听说有一本叫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的书，大家都争抢着去借来看。”

朱晓枫的老师中也有中共地下党，“少年团”里有秘密党组织，她就是在那时候入的党。“1945年，我不满15岁，语文老师潘超就是我的人党介绍人。”朱晓枫说，虽然入党了，但组织里还有谁，她根本不知道。在少年团，除了学习，还要开展抗日宣传。她经常和好友黄莘一起去中班、小班，教给他们小的孩子们演唱抗日歌曲，赴抗日前线巡回演出，组织募捐活动等。

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。台湾义勇队返回台湾，朱晓枫也随团去了台

湾，在李友邦家住了半年后，又回到大陆，和母亲生活在一起。1946年，母亲朱枫为了工作，送女儿去苏北解放区读书，在上海吴淞口码头，朱晓枫与妈妈告别。“没想到这竟是永别。从那以后，我再没有见过妈妈。”

1950年，朱晓枫接到通知，她的妈妈朱枫已在台湾牺牲。刚满20岁的朱晓枫，听到消息后很平静。她说：“妈妈一直在做秘密工作，非常危险。她牺牲前，曾有两三次被捕的经历。她有一根手指头因受刑而残废了。”那时，她将陈明珍的名字改为朱晓枫，以此来纪念她的母亲朱枫。

采访时，朱晓枫对70多年前的一些事已记忆模糊，可当我们问到《台湾义勇队队歌》时，她的精神一振：“我们是抗日的义勇军，是台湾民族解放的先锋队，要把日寇驱逐出祖国，要把他在台湾的锁链打破！为正义抗战保卫祖国，解放台湾，把日本帝国主义整个摧毁！整个摧毁！……”

黄莘：“这是妈妈留给我的”

黄莘，1928年出生，台湾云林人，上海电视台离休干部。黄莘一家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，日本占领台湾后，强迫台湾同胞学日文、讲日语、取日本名字。黄莘父亲不满日本殖民统治，带着5个子女来到祖国大陆。“七七事变”后，日本侵华战争更加疯狂。黄莘父亲作为医生，参加了由李友邦将军领导的台湾义勇队。在父亲的影响下，黄莘和姐姐、弟弟三人一起参加了台湾义勇队少年团。

黄莘与朱晓枫年龄相仿，两人又是好朋友，她在少年团的经历几乎和朱晓枫一模一样。1945年日本投降，黄莘一家随台湾义勇队返回台湾。没想到，回台湾的义勇队遭台湾当局解散，黄莘被李友邦安排在家乡一所小学任教。1947年，黄莘再次离开台湾，来到祖国大陆工作。1949年黄莘参加解放军苏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。解放后，黄莘转业到上海，一直在上海电视台工作到离休。

1982年，在台湾的母亲路过香港时联系黄莘，可惜未能如愿。1987年，黄莘终于到香港与母亲和几个弟妹见面。母女见面，相拥痛哭，母亲告诉黄莘，全家十几口人，只有黄莘不在台湾家中，父亲最想她，临终前还呼喊她的名字。

1990年，黄莘赴台探亲。但台湾当局一直不准黄莘的老伴赴台。直至2002年，夫妻俩才一起去了台湾，可惜黄莘的父母都不在了。黄莘在台湾除了拜祭父母，还专程去拜访了李友邦将军的夫人严秀峰女士，并到李友邦将军墓地献花致敬。

记者今年5月赴上海采访黄莘时，88岁高龄的黄莘女士已经病重住院。我们赶到医院，见黄莘非常虚弱，无法接受采访。其子姚小未提议，拿出外婆送给妈妈的礼物——一件毛衣，看能否出现奇迹。原来，1990年母亲去世前，送



朱晓枫

黄大哥接受采访

病中的黄莘抚摸妈妈的毛衣

给女儿一件她亲手编织的毛衣。黄莘非常珍惜这件毛衣，平常舍不得穿，想念母亲时，就拿出来看看。

毛衣是枣红色的，领口、袖口和下摆已褪色起球了，但当毛衣被递到黄莘手上时，她开口说话了：“这是妈妈留给我的……”我们噙着泪水，撤下了相机的快门……

黄中一：“他们还是叫我黄大哥”

黄中一今年已94岁高龄，当我们到达他上海华山路的家时，老人穿戴整齐，胸佩三枚抗战纪念勋章，精神矍铄，步履硬朗。两个多钟头的采访，他思路敏捷，谈起70多年前的往事，好像在说昨天的故事。

黄中一原名黄志义，1940年受中共地下党指派，应李友邦将军邀请，到台湾义勇队少年团担任指导员。当年18岁的他，视小伙伴们如自家弟弟，被小伙伴们亲切地称为“黄大哥”。

在那段烽火岁月里，由于少年团的孩子们年龄尚小，他组织孩子们学文化、说相声、排独幕剧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。他们虽身处后方也有危险，黄老向记者回忆说，1941年，他带7名少年团员和电影队，到浙江宁波地区慰问前线官兵。一天清晨，他接通知说镇海沦陷，要他们立即撤退。他们刚离开宁波市，市区就传来了爆炸声。他们刚过新昌，新昌又被敌机投入大量燃烧弹。在腹背受敌的紧急关头，他们沉着应对，连夜冲过嵛县，跑出了日本人的包围圈。

抗战胜利后，他把少年团的这批孩子护送回台湾，得到了台湾义勇队队长兼少年团团团长李友邦将军的高度评价。

黄中一老人记忆力非凡，至今能说出每一位少年团团员的姓名、年龄等基本情况，对他们当年演出的《台湾少年》、《表》等剧目还能为我们详细介绍。他带领少年团走过的金华、武夷山、龙岩、连城等地，他能准确说出当时的时间、事件等细节，帮助我们补齐了对那段历史的空白点。

2009年，时年88岁的黄老受邀去了台湾，和台湾义勇队的许多老朋友相见甚欢，迈入耄耋之年的老队员们在了一起叙旧，黄老笑着说：“他们还是叫我黄大哥，呵呵，开心得不得了。”

在迎接抗战胜利70周年暨台湾光复70周年之际，黄中一对记者说，台湾义勇队当年的抗日活动，是中华民族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海峡两岸同胞并肩战斗、抵抗外敌的历史见证。在新时期的今天，台湾同胞应发扬爱国爱乡的优秀传统，为两岸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。

(本文照片均为杨雨文摄)



少年团的老照片

状元还是爱港校

小夏

据香港媒体报道，参加内地“全国统一招生计划”录取高考生的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，今年共录取内地513名考生，其中香港中文大学录取305人，香港城市大学录取208人。

香港中文大学在回应记者问题时介绍，中大在录取考生时没有任何加分政策，完全视考试得分和个人志愿录取。今年录取的考生均在各省的前百名之内，有20名为省市或单科状元，原计划录取300人，后又应有些省份的要求扩招5名。考生来自全国31个省、自治区、市，包括陕西省数学满分得主任含希，内蒙古自治区牙克石市的理科状元毕雪滢，安徽省英语满分得主陈思涵等。中大还录取了新疆库车县等地家庭清贫的考生和14名少数民族考生。

香港城市大学录取了208名考生，据学校介绍，他们为内地学生设立了入门奖学金，包括全额奖学金每年16万(港元，下同)、学费全免奖学金每年12万，还有全国奥数、国际竞赛获得者奖学金、华润少数民族奖学金等。获入门奖学金的考生英语成绩要达到135分以上。

除了参加“统一招生计划”的港校，香港大学、香港教育学院、香港浸会大学、香港科技大学等则自主招生。自2003年起，香港大学等8所公立大学已在内地招生。此后，招生的学校和范围不断扩大，内地考生也经历了从盲目到理性的过程，但不少状元们还是选择港校，一项调查显示，至2014年，内地有48名高考状元选择了香港大学。

香港书展人均买书近千元

虹文

本周，第26届香港书展闭幕，书展期间有超过百万人次入场，人均消费903港元。书展期间在场内抽样访问超过800位参观者，近一半的受访者表示参加书展是为了选购新书，其中56%的人表示选购小说，28%的人要买旅游书，25%的人要买漫画。

在阅读习惯方面，有99%的受访者表示过去一个月曾经阅读印刷书，平均阅读印刷书的时数为25小时。而过去一个月曾经阅读电子书的受访者则有六成，平均阅读时数为22小时。受访者过去一年购买印刷书的平均花费为1786元。

一周热词：毛霉菌

据香港媒体报道，香港玛丽医院过去3星期发现2起毛霉菌感染病例，医院正就此事件展开调查，初步怀疑可能与床单或病人衣物有关。院方已于上周末更换全院所有床单及病人衣物清洁消毒。

2009年玛丽医院曾发生多起血癌病人感染毛霉菌甚至死亡个案。毛霉菌存在于土壤、粪便、空气中，在高温、高湿度以及通风不良的条件下高速繁殖，会侵犯血管壁引起血栓，或伤害呼吸道、胃肠道和食道。

通道畅通，并没感觉不方便，车站充满节日气氛也不错。建议今后台北车站预先通知，让当天的乘客有心理准备。“如果一年只有这么一天，可以接受。”

虽然人潮会带来管理的不便，但台北车站成人之美，不少办公室管理人员带领暑期实习生到现场维持秩序，加强清洁工作，车站用印

尼语反复提示保持清洁和尽可能的安静，现场秩序一直不错。对此，台湾铁路表示，他们一个月前就开始准备工作，规划现场指示牌和通道以及垃圾收集，提前找好印尼语翻译。

此前，在台北车站庆祝开斋节引起过社会争议，有人认为外籍劳工“攻陷”台北车站，席地而坐的人潮有碍观瞻。但也有人认为这种想法有歧视之嫌。台北车站今年决定采取友善态度化解争议，尝试兼顾乘客权益与外来劳工的节庆需求，打造和谐的城市形象。但他们也没想到今年车站过节的人数倍增，估计一方面是网络传播的作用，另一方面是外来劳工的权益有所改善，雇佣家庭不再阻拦他们请假过节。

台北车站万人聚餐

邵文欣

上周日是伊斯兰教开斋节后第一个周日，台北车站出现万人聚餐的大场面。虽然台湾的伊斯兰信众不多，但台湾有超过57万外籍劳工，其中印尼籍最多，超过23万人，大多数从事居家服务，分布在台湾各地。

开斋节是伊斯兰教重要节日，台北车站坐拥地利之便，空间足够大，过去几年每逢开斋节都自发聚集不少外籍信众，他们三五成群席地而坐，带着食物和亲友一起分享，有人还低声哼起家乡歌谣，一派节日气氛。

但今年居然涌入了6万人左右，不少来往旅客被这阵势吓了一跳。好在大多数体谅他们远离家乡无处过节的难处。一名乘客对采访的记者表示，并不知道是开斋节，刚进大厅看到这么多人吓了一跳，好在买票和进出站的



香港小学生夏练三伏

暑期，参加“香港青少年山西绛州鼓乐研习活动”的香港小学生，在国家非遗绛州鼓乐艺术团老师的辅导下，有板有眼苦练基本功。

高新生摄